芦苇秀

刘江滨

有水的地方就有芦苇。池塘、河岸、湖边,不用刻意寻找,它都会不经意地出现在你的视野中。一丛丛,一片片,天然一派野趣。

我最早见到芦苇是在村西的池塘。我们当地将池塘唤作大坑,那时坑里常年有水,夏天水多些,冬天水浅些。南北岸皆有一眼甜水井,也从不干涸。我们这个平原小村,无山峦之高峻,无河流之汤汤,平淡无奇,了无风景。然而,大坑里的芦苇丛却长得葳蕤茂盛,给单调乏味的村野平添了一份怡人的景致。

春暖时分,“蒌蒿满地芦芽短”,芦芽从湿润的泥土里拱出来,状似竹笋,只是更加尖细。及长,远远望去,仿佛地上插满了箭矢。倏忽数日间,芦苇蓦地满坑葱绿,蓬蓬勃勃,犹如长成的少女,舒展高挑曼妙的身姿。芦苇与竹子有几分相像,都属禾本科,高大,有节,茎中空,但竹子硬挺,芦苇柔脆。叶子长而尖,茎秆细而高,芦花在顶端飘散,一阵风吹来,芦苇集体随风起舞,摇曳多姿,令人赏心悦目。“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待到秋末,芦苇丛一片金黄,芦花白茫茫,好像下了一场小雪。正如唐代诗人雍裕之所写:“夹岸复连沙,枝枝摇浪花。月明浑似雪,无处认渔家。”(《芦花》)

村西这大坑,呈椭圆形,东深西浅,东半部是水面,西半部是芦苇丛。芦苇丛又一半在水里,一半在陆地。每到暑天,大坑就麇集了村里不少男人尤其是男孩。炎炎烈日下,水面温烫,水下却沁凉,跳入水中泡一泡,暑气全消,打打扑腾,更是畅美。这情景,令有些路过的、挑水的或在大坑边洗衣的女人,汗溻衣衫,不免眼馋。不过不要紧,芦苇派上了用场。及晚,或星斗满天,或皓月当空,可听见西侧浅水的苇丛中传来哗啦哗啦的撩水声、喁喁私语声,只闻语响,不见人影,芦苇充当了护花的卫兵。

到了枯水季节,大坑的水完全退到东侧,芦苇丛只是呼吸着水汽的潮润,地面如同庄稼地。苇丛有繁密处,也有稀疏处,我有时会跑到里边去玩,享受隐没其中外面绝对看不见的乐趣。没想到,这一玩竟然鸿运当头,偶遇意外的惊喜。那天,我又钻进苇丛,却见一只母鸡摇摇摆摆往出走,我好奇心顿起,顺着母鸡出来的方向,往深处一走,天啊,一堆柔软发黄的苇叶上竟然卧有四五个鸡蛋,白灿灿晃眼!原来母鸡丢蛋丢到这里来了!在农村,母鸡下蛋不下到自家鸡窝,却下到别处,叫“丢蛋”。这样的事常有,因丢蛋产生邻里纠纷也常见。主家女人疑心母鸡将蛋丢到谁家,而不见还回,便会在院里甚至站到房顶指桑骂槐。也别怪人们吝啬小气,为一枚鸡蛋撕破脸皮,要知道,在生活困难时期,养鸡有“鸡屁股银行”之称,家里收入全靠几只母鸡哩。如此一说,你便知我是多么的高兴,恍惚间似乎闻到了馏鸡蛋的清甜和炒鸡蛋的香味,有多久没吃过鸡蛋了?都不记得了。这芦苇丛与农舍并没有挨着,不知这只母鸡为何跑这么远丢蛋,恐怕主人家都不会想到。尝到这次甜头,我就不时去苇丛踅摸,但可惜再也没有遇上这种好事,以至于在苇丛玩都意兴阑珊了。

小时候我有一度痴迷吹笛子,一支竹笛,口吹指按,很是神气。笛子有一孔叫膜孔,贴的膜就是苇膜。选几根品相好的芦苇,用刀削断茎秆,取出一个拇指大小的薄膜,在膜孔周边涂上胶水,粘上即可。这个膜是必需的,声音的清亮宛转由其震动而发出,没膜也能吹响,却聒噪刺耳。然而,苇膜取之极难,稍不留神就破了,而且合适的苇秆不好寻觅。久之就失去耐心,我常撕一片白纸甚至报纸代替苇膜,倒也马马虎虎。记得常吹的歌曲是《东方红》《北风那个吹》《洪湖水浪打浪》,痴迷之深,以至于握住有把儿的东西,手指就不由自主地起伏翻飞,好似在按笛孔。后来读书看到一则轶事:唐玄宗一次上朝,神情恍惚,手指不住地在肚子上按来按去,散朝后,高力士问皇上是否龙体欠安,唐玄宗说,昨夜梦见吹奏玉笛,嘹亮清越,所以我一直在回味寻找呢。读此,不禁会心一笑。只是不知道,皇帝老儿的玉笛用的也是苇膜吗?

芦苇天然生长,年年绿了黄,黄了绿。擗一把苇叶可包粽子,轻柔的芦花可作枕芯,绑一束芦花(穗)可作扫帚,苇秆编成箔,当帘子、苫屋顶用。家里铺的炕席和凉席,差不多都是苇子编成的,躺在上面一股清新的苇子气息依稀尚闻。说起编席,不禁想起孙犁小说《荷花淀》中的一段描写:“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白天破好的苇眉子潮润润的,正好编席。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苇眉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这女人编着席。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就编成了一大片。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在孙犁笔下,女人夜晚编苇席的劳作被赋予优美的诗意。

2003年夏天,白洋淀孙犁纪念馆举行落成典礼,我躬逢其盛,第一次见识了芦苇荡的浩渺与广袤。相比我们村那小片苇丛,这里才是芦苇的世界。乘一叶轻舟在芦苇丛中穿梭,水道沟沟汊汊,七纵八横,浓密繁茂的芦苇仿佛碧璃的绿云,又像一道道绿色的屏障。高挺尖细的芦苇与圆润阔大的荷叶相映成趣,朵朵艳红的荷花绽放其间,亮人眼目。一群水鸟在空中飞翔,在水面掠过,啾啾鸣叫,给这偌大的芦苇荡增添了勃勃生气。遥想当年,雁翎队在芦苇荡伏击日寇,战士们头顶荷叶,嘴衔苇秆,神出鬼没,打得鬼子晕头转向。这在孙犁小说和徐光耀《小兵张嘎》等作品中都有鲜活的描述。京剧《沙家浜》中那个新四军隐藏战斗的芦苇荡,也铭刻了一个时代的红色记忆。芦苇荡和平原上的青纱帐一样,书写了人民战争不朽的传奇。

芦苇是生在水边的寻常植物,却也被文人赋予了精神的意蕴。《诗经》有云:“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谁说黄河宽阔啊,凭一根芦苇就可渡过去。这当然是夸张之词,极言游子思归的急迫。有学者胶柱鼓瑟,说“一苇”不是指一根,而是一束,如同桴筏(唐·孔颖达),真是大煞风景。禅宗始祖达摩“一苇渡江”的故事,也源于此。达摩被人追至江边,无船可渡,遂信手折一根芦苇,立在上面飘然而过。这才是令人惊叹的神奇。古代二十四孝中有一个“芦衣顺母”,一件轻飘飘的芦花冬衣,无法承受人性之重。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有一句名言“人是会思想的芦苇”,他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我想,帕斯卡尔之所以拿芦苇说事,想必是他经常在河畔徘徊,目睹芦苇由春及秋,从葱郁到枯萎,想到人亦不过如此,但他找到了二者的不同之处,人的尊严与高贵在于有思想,思想可以使人永生。

我喜欢芦苇,或许因为它和我的名字有一种天然的缘分?每到一处公园或河边湖畔,看到芦苇即顿生快意,总是要驻足流连一番。芦苇和草一样多为野生,一块湿地即可滋生蔓延,生命力勃郁强韧,无须像那些名花佳木要人精心侍弄。然而,即便它不被注目,无人理会,仍自由自在地存乎天地间,有风既作飘摇之态,无风则呈玉立之姿,默默地展露出别样的风致,别样的美。

天津工业史话(十九)

近代天津工业发展的启示

任吉东

沽上丛话

近代天津无疑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从1860年开埠先后出现了包括军工、机器制造、化工、制药、纺织、建材、制革、面粉等一大批先进的制造工业,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发祥地之一。

根据廖一中先生的研究,最晚至1903至1912年,在金属加工业厂、水泥业厂、火柴业厂、烛皂业厂、呢绒业厂、面粉业厂、榨油业厂、卷烟业厂、饮食品业厂、造纸业厂和燃料采掘业厂等11个行业中,天津创办的厂数占全国总数的10%以上者有6个行业,占20%以上者3个行业,资金占10%以上者7个行业,占20%以上者5个行业,皆处于全国前列。

至1933年全市共有工厂1213家,约占全国12个主要的工业城市全部工厂数的13%,仅少于上海,居全国第二位;全市当年工业产值近9700万元(法币),占12个城市总量的7%,居第四位;资本总额2300余万元,占12个城市总资本的8%,居第三位,其中棉纺织工业居全国第二位,而精盐纯碱的研制和生产,更是弥补了我国化学工业的一个空白,并且形成了门类齐全的生产技术系列,近代天津已然成为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和工商业中心城市之一,“当时天津工业的资本额度和产值都位居北方各城市之首,从而使天津的经济地位在全国经济座次中越来越重要,形成南有上海、北有天津的格局”。之所以能获得如此长足的发展,与当时天津工业企业的生产科技化和科技本土化密不可分。

天津近代工业的技术进步,从科技含量的递进层次来看,呈现出由出口原料、输入设备到仿制设备,再到自主创新的深化进程。

毋庸讳言,开埠后天津最早的工业多为外国洋行开办的出口加工厂,“这些工厂通常的规模一般是会有一两台机器的仓库,它们几乎代表了外国对天津工业的全部投资”。主要负责对当时出口的土特产品如黄花菜、药材、火石、乌枣与红枣、鹿茸、各种坚果、水果、棉花、腌菜等进行清洗、分类和打包。1860年英商隆茂洋行设立的打包厂,是天津工业史上第一家使用机器的工厂。此外,开设打包厂的还有英商的高林、华胜、安利德商的德隆和兴隆等。

洋务运动的开展使得天津成为洋务派的试验场,当时由政府在天津兴办的工厂企业即使按照国际标准也是与时代同步的。与资本主义先轻工业再重工业和军火工业的发展规律不同,中国的工业道路是先军事工业后轻工业,天津工业的发展亦是如此。作为军事工业的天津机器局和大沽船坞及官督商办的开平煤矿都是引进西方设备最早的企业,不仅标志着天津近代工业的产生,也是近代天津进行技术变革的开端。这一时期,不仅生产设备要全部依赖进口,如大沽船坞的机床全是高价从英国进口的废旧设备,而且天津各军火工厂所用的铜铁原料和煤炭原料,“为款甚巨,皆从海外购来”,制造的产品也以仿造为主。

随着民族企业的发展,大规模的机器设备进口拉开序幕。据统计,1900至1910年天津共进口了价值近430万海关两的机器,年均进口43万海关两,从1911至1920年进口值更高达810余万海关两,年均进口约81万海关两。天津著名的六大纱厂中,锅炉是从英国拨伯公司和美国司特林公司进口的,发电机是从美国奇异电气公司进口的汽轮发电机,棉条、粗纱、细纱等机器则是从美国沙格劳维公司进口的。在大量引进西方先进设备和技术的同时,天津企业也开始对西方设备进行仿制,如天津郭天成机器厂从加工日本织布机零件到仿制日本织布机成功,这些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也奠定了天津三条石地区机械业的基础和促进了中小企业的飞速发展。到1931年,天津很多较大的机器厂和铁工厂都能仿制外洋磨具制造机器。

科技的力量在于创新。在经过大规模的引进和初步仿制后,天津的工业企业也纷纷开始自主创新。1917年的永利制碱公司就经历了设备进口和技术创新的混合发展历程。虽然作为国内第一家大型碱厂,国内不能自制的如锅炉、发电机、压缩机、真空泵等设备均从美国购买,但在制碱的技术上,经过长期潜心钻研,打破了一直被苏尔维集团企业垄断的苏尔维法制碱技术,生产出了碳酸钠含量达99%以上的洁白纯碱,永利“红三角”牌纯碱也在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获得金奖,为中国现代化学工业奠定了基础。

与科技创新同步的就是人才队伍的创新。世界工业史的发展证实,凡是工业后发国家,都会面临本国技术人才培养的急迫问题。只有培养出一批能够懂得和掌握近代生产技术的本土人才,引进的先进科技才能真正意义上做到本土化。天津早期工业企业中的技术工人,大多来自南方地区,如天津机器局“所雇华匠,皆是香港等洋厂募来”,而洋务运动中建立的企业,都不同程度地延聘“西人教习”,为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就必须培养本国的技术力量。

近代天津的科技人才培养一方面受益于赴美留学生的加盟,这批最早的留美学生,“除因事故撤回及在洋病故二十六名外,其余九十四名,均于光绪七年分作三批回华,头批学生二十一名均送电局学传电报,二三批学生内由船政局、上海机器局留用二十三名,其余五十名经臣札饬津海关道周馥会同机器、电报各局逐加考验,分拨天津水师、机器、鱼雷、水雷、电报、医馆等处学习当差”。这些留美学生成为近代天津工业企业的骨干技术人才。

另外,天津还先后开办有大量新型技术学校,如天津电报学堂、北洋水师学堂、总督医院附属医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北洋医学堂、天津北洋大学堂、北洋工艺学堂(直隶高等工业学堂)等;部分企业还附设有文化教育机构,注重生产技术力量的培养,如劝工陈列所、实习工场、教育品制造所、北洋劝业铁工厂图算学堂等,这些教育机构无疑为天津近代工业发展和科技进步奠定了源源不断的人才基础。

天津工业史在天津近代史中举足轻重,它不仅为“近代百年看天津”留下了丰厚的工业遗产与工业文明,更为今天天津“制造业立市”奠定了雄厚的历史基础与精神底蕴,提供着源源不竭的内生动力。

系列文章“天津工业史话”至此刊发完毕。从下期开始,本专栏将连续刊发杨仲达先生的系列文章“《曙光》纪行”。

——编者

构建中国语境中的比较文学主题学

杨书睿

孟昭毅教授的新著《比较文学主题学》最近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计六十余万字,分量厚重,墨有余香。主题学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学术范畴,作为国内首部研究专著,此书集主题学的理论阐释、史料梳理、文学举隅于一身,尊重原史、原典和原理,强调理论架构与实践开展的结合。作者将自身深厚的学术经验和广博的文化学识熔铸其中,力图构建中国语境中的比较文学主题学。

天津一直是国内比较文学研究的重镇,被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四任会长曹顺庆称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发祥地和福地”。1983年国内第一次比较文学研讨会就在天津举办,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目光。近四十年过去,当时的参会者们如今已经成为中国乃至国际比较文学学界的中流砥柱,孟昭毅教授便是其中一员。他所任教的天津师范大学也是国内最早开设比较文学课程与获批比较文学学科硕博士学位授权点的高校之一。

《比较文学主题学》是孟昭毅教授多年进行主题学研究的成果,花开“理论编”“史论编”“实论编”三朵,内容翔实,例证丰富。“理论编”中,作者以发生学的方法考察了主题学的起源与流变,综合本体论的定位、认识论的解读和方法论的阐释剖析了主题学的哲学内涵,并论述了百年来中国学者在主题学学科史研究上的贡献。“史论编”中,作者通过分类评述中国主题学的民间文艺学、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三大研究范畴以及代表学者的研究观点,以时间顺序绘制了主题学研究的中国谱系。“实论编”则是作者开展比较文学主题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汇总。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兼重东西方文学,从文本出发进行主题研究、母题研究、题材研究、人物研究等方面的论证,此书也因此具有了世界文学意义上的普遍性与说服力。

作者能在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中钩稽古今,连缀中外,依靠的是自身丰富的学术经历和焚膏继晷、笔耕不辍的毅力。熟悉孟昭毅教授的人都知道,他的研究方向是东方文学与文化,围绕神话、史诗、戏剧、民间故事等多种文类,在一众以西方文学为基础的比较文学研究者中形成了自己突出和卓有成绩的学术特点。

事实上,由于作为学科建制的比较文学在中国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成型,因此诸多学者是与其共同成长起来的。孟昭毅教授也是如此。从在北京大学跟随中国比较文学创始人季羡林深入学习东方文学,到在多年的教学科研活动中开展立足于文学文本的比较文学研究,他始终处于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在场”。正因如此,此书中“比较文学主题学的形成史几乎就是一部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的观点才更加令人信服,我们也才能更好理解为何作者不仅能在诸多繁复的理论阐释中张合自如,还能在卷帙浩繁的文学主题中拣选珠玉以作实证。

全书最基本的学术立场,无疑是时刻穿插其中的“中国语境”。诚如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所言:“中国比较文学的产生是与振兴国家民族的愿望、更新和发展本民族文学的志向分不开的。”因此,《比较文学主题学》中最重要的一点在于21世纪中国语境下的主题学定位。受强调实证主义的法国学派和主张平行研究的美国学派的影响,以往中国比较文学主题学的定位总是桎梏于研究范式与学理基础的藩篱而呈现出模棱两可的状态。作者借对主题学发生的溯源,将比较文学中久被忽略的德国领地重新带到中国学者面前,又在后理论时代的大背景下把握、梳理主题学研究的中国特点,摆脱以往窠臼的同时展望主题学作为中国乃至国际比较文学研究中新的学术增长点的可能。这也是在提醒研究者们,形成自身逻辑严密的研究框架固然重要,但更要时刻鞭策自身以避免被框架束缚,并期待着每一次破框而出后所获得的学术突破与心灵愉悦。

在作者的自述中,他谈到自己对主题学的关注由来已久:它“仿佛是夜航中遥望远方的一簇光亮,忽而隐隐约约忽而光灿诱人”。心之所向,素履前往,从一些单薄模糊的想法,到形成有明确学科意识的研究方法,再到《比较文学主题学》的面世,作者在其中倾注了三十余年的执著与心血。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新的、有价值的学术研究领域的发掘,不仅需要灵光一闪的机缘,还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持之以恒的决心。而在主题学这片广袤肥沃的土地上种植、收获属于自己的甜蜜果实之后,作者还为后人留下了可供借鉴的典范与深入研究的可能。

满庭芳 第五〇七六期

33 “红海”本是蓝色

天生是配角

律师文化纵横谈

杨仲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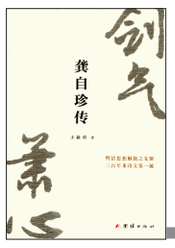
作家出版社

“红海”和“蓝海”是阐释商业理论的比喻。如果把律师行业的业务也和商事领域作个类比,那绝大多数的律师还在那片“红海”当中厮杀。受教育背景、视野、所在地域的局限,绝大多数的律师还是在传统法律服务领域里工作。比如最常见的刑事辩护业务、人人可能都会遇到的婚姻家庭问题、最简单的咨询和代书。这些业务的需求多,而又是律师入门就要学习的基本功。相比较而言,这样的业务面对的群体是基层群众,可能收不上来更多的服务费。这就是前面所说的很多律师在红海里厮杀。律师行业也已经讨论很多年了,有没有一片用不着如此竞争的“蓝海”呢?答案是不仅有,而且早就找到了。如果能熟悉国外的法律并且有一口流利的外语,那就可以成为涉外律师,市场一下子就扩大了好多倍。熟练地掌握一门以上外国语言,的确能为律师打开通往世界的窗户。但到目前为止,能熟练地运用外语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仍然为数不多。绝大多数律师,有过苦学苦练外语的理想,但在生活和工作的奔忙当中,还是挤不出时间来学习,于是原来干什么,现在还是在干什么,周而复始。

律师必须是一种复合型的人才,承办好一个法律事务需要懂的知识太多了,熟读法律以外,如果能熟知科技、经济和金融,并且把这些知识融会贯通,那简直是如虎添翼,其实这都还不够,还要懂得世间百态和处世法则。没有开垦的土地毕竟还是有,没有厮杀的蓝海也是大片和宽阔的。吊诡的地方在于,蓝海找到了,就在那里,而且基本没有人在那里面游,但是别人不去,自己也不去。不算少数的律师空有想法,难有行动。因为没有学会驾驭蓝海的本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极少数人在那里冲浪。这就有些遗憾了,并不是有一本武林秘籍或者一个世外桃源遍寻不到,很容易找到,而且果实就挂在树枝上,只是可惜枝头高了一些,又不愿意努力地跳起来。

而话又说回来了,在传统的法律服务行业领域里,比如刑事辩护,就没有机会了吗,就没有蓝海了吗?也不能这么说。就算是最常见的法律事务,在看似机械重复的劳动当中,找寻它内在的规律,不断地精进,也一样能够做得与众不同。更何况这些传统业务也并不简单,其实哪一个看似简单的法律服务领域里,都有艰深的课题和巨大的机会。人生哪里都是机会,而做好每一件事情,都不是很容易的,做好了,红海里也能有属于自己的蓝海。

65 搜集图书趣事多



龚自珍传

王振羽 著

团结出版社

钮树玉独抒新见,撰写了《说文段注订》八卷,这确实使龚自珍十分敬佩。这使他自然想起外祖父的教诲:“学问门径自殊,既不相谋,远而望之皆一丘一壑耳,身入其中,乃皆成泰山沧海,涉历甘苦皆无尽也。”龚自珍虚心向钮树玉求教,钮树玉也尽心指点,二人遂成莫逆。他写诗称赞自珍:“浙西挺奇人,独立绝俯仰;万卷罗心胸,下笔空倚仗。余生实鄙陋,每获亲倜傥;遍览所抒写,如君竟无两。”他还热情洋溢地鼓励自珍努力学习:“君今方盛年,负志多慨慷;大器须晚成,良田足培养;阳气已潜萌,万汇滋生长。”

还有一个人叫何元锡,字梦华,号蝶隐,浙江钱塘人,是龚自珍的老乡。他是清代著名的目录学家、藏书家,家中有许多古书善本。何元锡嗜古成癖,特别喜欢抄书。据说,他只要听说某山中有残砖断碣,就翻山越岭、披荆历险去搜寻,一定要找到才罢休。有一次进入深山,迷了路,幸亏有山里人领路,才摸到了家。他们帮助自珍搜集典籍,凡是文渊未曾著录的,自珍都要千方百计搜寻到,甚至不惜重金购买。实在买不到就让人抄录,有时也自己亲自抄录。

为搜集图书,他还遇到过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有一次他在一个西湖僧人的经箱中见到一本手抄的《心经》,已经被蛀虫损坏了大半部分。他从一个轿夫那里得知可能是杭州螺蛳门外一个老者抄写的,就特地去寻找。路上他碰到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自珍向他问路,他故意推说耳聋。自珍称他是“真隐者”,他却故意打岔说:“我没有印章。”自珍无奈,只好失望而归。

何元锡也告诉他一件类似的事:何元锡有一本宋人的《李斯琅琊石》拓片,非常珍爱。他有宿疾心疼病,久治不愈。一天城外来了一个老者,自称能够治愈何元锡的心绞疼。何元锡用了他两剂药,果然痊愈了。何元锡正要酬谢他,他说他是为那宋拓《李斯琅琊石》来的,说罢径自取了那本书,没通姓名就走了。

隔日,自珍见到了曾经做过太常寺少卿的马秋药。他把自己碰到的老者和何元锡说的老者的情形告诉了马秋药。马秋药立即联想起一件事来:马秋药有个外甥名叫马琐成,一天走错了路,误入一家荒凉的宅院。只见满院扔满了松花石。循着读书声,他来到一所房子。只见屋子的墙壁上挂满了锦囊,锦囊里装满了金石文字。一个老者在屋中读书,书案上放着一本《谢朓集》。琐成想借来看看,那老者不肯借给。最后却答应给琐成抄写一本,一个月后让琐成去取。

20 酒喝得有点儿猛

警 卫

晓 重 著

作家出版社

高克己记不得自己是怎么从李正弘家里出来的,他感觉头有点昏沉沉的,要不是推着电动车当拐棍,他也许会摔倒在地上,但他记得在说出大师兄成玉坤名字后,李正弘跌落在椅子上,然后很快地操起酒瓶往杯子里倒酒,他也跟着抢过来倒酒,两人像赌气似的你一杯、我一杯地往嘴里倒。李正弘指着高克己说:“成玉坤的死跟你、跟我,半毛钱关系也没有!”高克己使劲儿地拍着桌子:“怎么没有关系,他是我们的同事,是战友,是我们的师兄弟!”李正弘的手有些颤抖:“是,可全国每年牺牲多少警察,你知道吗?他们都是咱的战友、兄弟,你管得过来吗?”高克己眼睛盯着李正弘:“我说的是,当年在车上如果我的判断是对的……”李正弘打断高克己的话:“‘窝囊废’,你什么时候对过?”高克己仍盯着李正弘:“‘钻天猴’,你别欺人太甚!”

就在这个时候,门被推开了,李正弘的老婆徐娅晴走进来。李正弘和高克己都愣了,过了几秒钟,李正弘问道:“你怎么回来了?”徐娅晴用眼神扫了一眼杯盘狼藉的桌子:“我今天不值班,正好回来给孩子拿钢琴资格证,你们这是……”高克己醒过神儿来,急忙朝徐娅晴摆摆手说:“娅晴,不好意思,我有点儿喝猛了,处长家里的酒上头,喝着喝着就晕了。”徐娅晴仍客客气气地说:“没关系,你和正弘都是老哥们儿,就应该多串串门、聊聊天,多喝两杯不碍事。不行的话,酒先给你留着,下次来再接着喝。”

高克己就是再傻,也听得出来这是下了逐客令,更何况他也不想再待下去了。于是,他拿起自己的包走到门口,把想要说的话最终咽回到肚子里,转身走出门去。看着高克己走下楼去,徐娅晴关上门,对李正弘摇摇头:“该给你的面子都给你了,该维护你形象的也维护了,现在说说咱俩的事吧。”李正弘冲着徐娅晴喊道:“我跟你说什么?说你天天不回家,是因为公司工作忙?说你不相夫教子是因为干事业?我今天再一次明确地告诉你,我不跟你离婚!”

走了两条街道的高克己,突然被手机铃声叫停了,是颜伯虎打来的:“你跑哪去了?给你打这么半天电话都不接,东西不要了?”高克己想起来,颜伯虎今天晚上要给自己送点儿油和大米:“哦,我这就回去,你等着我。”对方说:“你直接到家门口的那个小饭店吧,我还没吃饭呢。”高克己走进烟雾缭绕的小饭馆,就见颜伯虎朝他招手。他走过去拉开椅子一屁股坐上去,嘴里不停地喘着粗气,呼出来的酒气直冲向颜伯虎的鼻子,弄得颜伯虎急忙把桌上的菜和酒杯端起来说:“你干嘛呢,跟谁喝成这样,可别吐到菜里。”